

武汉大学图书馆七十年

潘 伯 善

武汉大学图书馆是我国历史较久的高校图书馆之一。它不仅因馆舍雄伟壮观闻名于世,而且也因藏书丰富为人们所知。现在,它的年入藏量为十一万册,年订各类报刊四千三百余种。馆藏总量已达一百八十万册,其中图书约占88%,期刊合订本约占12%;社会科学类图书约占65%,自然科学类图书约占30%,其余为工具类图书;外文图书约占30%,线装书约占15%。馆藏中除大量文理科教学和科研参考书及不同版本、不同文种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还有一批其他很有学术参考价值的珍贵书刊资料,如我国宋刻、元、明递修本《资治通鉴纲目》、元刻本《应城县志》(孤本)、明嘉靖《御地志略》(稿本)、《援韩野纪》(稿本)等五百余种善本书。有收藏完整的西德《化学学报》、美国《物理评论》等多种外国重要报刊。另外,我国的类书、字书以及苏、美、英各国的大百科全书等各类中外文工具书也比较丰富。馆舍分为三处,总面积约九千平方米。各种工作人员百余人。组织机构,除办公室外,共设五个业务组,分别负责采购分编、典藏调配、外借阅览、期刊工作。设有五个外借处和九个阅览室。其中,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是教育部在全国所设外国教材中心之一。本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物的收藏馆,也是武汉地区高校图书馆部分原版书目中心。目前已和国内外六百多个单位有业务联系,还开展馆际互借和静电复印等工作。本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本校师生员工,同时也接待部分校外读者。现在每年接待读者为二十九万多人次。它是学校书刊资料的中心,是师生员工博览群书、涉猎各科知识、获取各种信息的重要场所,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和科研中起着重要作用。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以清末张之洞所创方言学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武昌高师。一九一三年建校伊始,“校舍图书多仍其旧”。学校设立了“图书室”,这是我校图书馆的起源。但是,何时正式建立图书馆,因缺乏历史记载,暂时无法弄清。据校史资料所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学校“另租赁校址东院民房为图书馆”,所以,有人就把这个日期作为本馆正式建馆时间。虽然不一定确切,但是,正式建馆不晚于一九一七年则是肯定无疑的。

本馆建立时间虽然比较早,惟当时军阀混战,时局动荡,民生凋敝,教育乏人过问,校务每至废弛,甚至一度被迫停办,图书设备不得不交给“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保管。一九二八年改建武汉大学时,书刊资料极为缺乏,“图书仅百数十种,且大抵不适用”,图书馆“可谓几空无物”。所以,建校初期,虽经十余载,图书馆工作却是苟延残喘,濒临绝境,完全谈不上有什么发展。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国民党政府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对教育的投资有所增加,学校图书馆也相应地有了一些发展。一九二八年后,学校开始成立图书委员会,专门拨出经费发展图书馆工作。当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校务会议通过图书委员会简章。对该委员会的职责以及委员长、委员的组成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年,校务会议还通过了图书馆规程,

第一条,本馆设馆长一人,商承校长总理馆内一切事宜。

第二条,本馆设总务、编目、订购三股,每股得设股长一人,事务员若干人,办理该股一切事宜。

1.总务股办理中西文牍、图书、杂志出纳统计及其他不属于他股事宜。

2.编目股办理图书分类、目录编制事宜。

3.订购股办理图书购买、登记号码及购书簿记事宜。

第三条,本馆每月开馆务会议一次,讨论馆内一切事宜。

第四条,各职员应按照规定办公时间到馆办公。

第五条,本规程经校务会议决施。

当时的馆长由文华大学教授胡庆生兼任。到一九二九年则由本校预科主任梁明致代理馆长。图书馆仍设三个股,共有十三个工作人员。经费也有了着落,学校“年定预算六万元为购置图书之经费”。因此,藏书量增加较快,已有三万七千七百一十五册。一九三〇年,藏书量增长一倍,达到七万两千余册,其中,中文图书五万三千余册,西文书一万七千余册,日文书约两千册,另有各种期刊两百九十四种。从内容来看,文学类占多数,其他社会科学类次之,自然科学类居三,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的图书。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梁明致先生被正式任命为馆长。图书馆开始从武昌东厂口旧校舍向珞珈山新校园的文学院搬迁。一九三二年十月,藏书达到九万四千一百八十册。

一九三三年九月七日,学校修改了图书馆规程,在馆长之下再设馆务主任一人,“商承馆长指挥各股人员处理馆务”。全馆共有十三个工作人员。教务长皮宗石兼代馆长,皮高品先生任馆务主任。组织机构仍设三股。这一年入藏新书近万册,一九三四年入藏新书两万余册,馆藏总量为十万零八千九百二十二册。

早在一九二九年,学校就决定建造新图书馆,一九三三年八月开始在狮子山顶平整地基,十月,“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通过设计方案,并经招标由上海“六合营造公司”承包施工。一九三四年元月正式开工,经过一年又八个月,到一九三五年八月,新馆即告竣工。图书馆面积为六千二百三十四平方米,前部四层,后部两翼书库各七层。书库设计容量为二十八万至三十万册,共有三百个阅览座位。大厅有暖气设施,外观呈宫殿式,琉璃瓦屋顶,矗立于狮子山巅,雄伟壮观,成为学校的中心建筑物。

一九三五年底迁入新馆后,工作面貌有了新变化。馆长仍由皮宗石教务长代理,皮高品先生仍为馆务主任,全馆共有十八人。机构也有增加,除总务股、编目股和订购股外,又增设了杂志股和出纳股。藏书量已有十三万余册,其中,中文书八万九千零七十七册,西文书三万零四百九十三册,日文书四千一百八十册,中文刊一千九百九十八册,外文刊四千二百八十七册。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前,藏书已有十四万两千余册,中外文期刊六百六十五种,近八千册合订本。

这一时期,图书馆其他工作也有发展,特别是分编工作。最初,本馆中文书采用的分类法是仿张之洞书目答问体例,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随着藏书的增加,又根据四库体例另行编制了分类法。西文书和新版平装书及日文书则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在编目方面,除编制卡片目录外,又先后编制了馆藏书本式方志目录、线装书目录、西文书目录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奉命向四川撤离,图书馆遂将五百八十三箱重要书刊于一九三七年冬先行运存宜昌,其余来不及运走的尚有四万二千一百二十八册,只好就地转移。一部分转移到汉口特区英商“怡和”栈房寄存,共一百六十九箱,其中线装书一百零四箱,期刊三箱,日文书十三箱,报纸十六箱,公报二十七箱,书目六箱。另一部分封存在本馆地下室,共有各类图书二十四箱。后来,这些未及运走的书刊大部被日寇洗劫。唯先行运存宜昌

的书刊，于一九三八年随校撤到四川乐山。但在西撤途中及在乐山期间，又遭敌机轰炸，致使七千四百余册书刊毁于战火，九十七箱落水受浸，存放在乐山郊区的部分书刊，复遭白蚁之害或散失。因此，藏书量急剧减少，一九四〇年四月，馆藏量下降到九万一千余册。

在乐山期间，图书馆规程有所改变，图书馆只设主任一人，“秉承校长及教务长之命办理本大学图书馆事宜”，由桂质柏先生任主任，全馆有十二人。因校舍分散，“古庙家祠，民舍官廨，”“校舍几遍全城”，图书馆也分散几处，总馆设在文庙内，分总务、采访、编目、阅览、期刊和装订等六个股，分馆设在李公祠理学院内和高西门外的工学院。抗战时期，各方面非常困难，“师生分居，忍苦负重”，不少学生“骨肉不通音问，纳衣枵食，饥寒无告”，甚至有几个教师“辛苦挣扎，窘困以死”。又常受敌机袭扰，师生员工难以安心工作和学习。图书馆因经费无力筹措，书刊购置一度中断，运到乐山的书刊大部分封存在郊外，师生借书无着，各项馆务难以开展，实际上一度濒于瘫痪。后来经过几年艰苦努力，藏书量才有增加，一九四六年复员武昌时又达到十五万余册。

在乐山苦撑了八年之后，抗战胜利了。图书馆于一九四六年六月随校返回武汉。不久，桂质柏先生辞职，由曾昭安教授兼任馆长。当时大批运回的书刊需要开箱上架，各项馆务急待恢复。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图书馆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全部开放，六月，各学院开始设置图书阅览室。

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积极推行“依美外交”，加紧投靠美帝国主义，“引狼入室”，帝国主义者乘机从各方面入侵。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发展“友谊”，以所谓“战后物资援助”为名，运进大批宣扬西方“文明”、麻醉中国人民的书刊资料。本校图书馆就是当时重要受“援”单位之一。因此，馆藏量很快就达到了十六万三千七百余册。美国驻汉口的“新闻处”经常来图书馆举办展览，放电影等，把图书馆变成了宣传所谓西方“文明”的重要场所。因而，出现了全校师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斗争如火如荼，轰轰烈烈，而图书馆内却冷冷清清、少人问津的局面。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也有许多外国朋友出于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憎恨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也向我们赠送了许多内容良好的书刊。例如日本著名出版家岩波茂雄先生等就是如此。一九四七年，岩波茂雄先生决定将岩波书店出版的每种新书寄赠给武汉大学等五所院校。这种友好之举，数十年来从未中断。对此，我们衷心感谢。

抗战胜利后，武汉大学出现的“六一图书馆”是很值得大书一笔的。

当师生员工自乐山回到阔别八年的珞珈山后，呈现在面前的是杂草丛生，满目凄凉的情景。但是，大家并不气馁，抱定决心重整校园。然而，在民生凋敝、百孔千疮、艰难竭蹶的国土上，国民党反动派不思复国，却大耍阴谋，蓄意制造内战，再次把人民打入血泊之中。对此，广大师生员工和全国人民一样，坚决进行反抗，因而屡屡遭到迫害。就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凌晨，一伙国民党暴徒公然冲进校园，开枪杀害无辜师生，使政治系学生陈如丰（台湾省人）、土木工程系学生王志德和历史系学生黄鸣岗三人肝脑涂地、饮弹而死，十九名学生受伤，二十二个师生被捕入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血的事实使师生员工进一步看清了蒋匪帮的真面目。正如当时清华大学学生社团在挽诗中说的那样：“血洗清眼泪，血照亮大路，血教训未死，血灌溉方生”。他们以更高的革命热情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斗争。大家意识到“行动必须由理智来领导”。他们迫切希望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真理。而当时的校图书馆在师生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无法满足师生这种要求。于是，学生自己办的“六一图书馆”就在血泊中诞生了。它是“富有革命意识的一个图书馆，它是负有武装武大人思想这

艰巨使命的一个图书馆，它是武大人自力耕耘所造成的一个精神食粮的仓库”。它受到师生倍加爱护。其藏书都是师生捐助的，有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有鲁迅、茅盾、郭沫若、赵树理等革命作家的著作，也有优秀的苏联小说等。到一九四九年，它的藏书已有四千八百二十三册，其中图书四千一百八十二册，期刊六百一十五册，地图二十五幅。它有一个阅览室，室内陈列着四百余册进步书刊。它还办了一个名叫《集体脑袋》的定期壁报。名称的意思是“要使武大成为一个‘集体脑袋’，使武大二千多师生员工脑袋里想的都是马列主义的”。

“六一图书馆”是在学校党的地下组织指导下，由学生自治会出面成立的。后来又推举在“六·一惨案”中被捕过的历史学家梁园东先生担任馆长。师生们不仅向它捐赠了大量书刊，而且踊跃地充当“馆丁”，热心参加馆内各项工作，并千方百计地保护着它。因此，它虽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阻挠、刁难和破坏，却能坚持活动，“尽可能搜集关于革命的书籍，半公开地传播革命的知识，对于武大同学的思想改造打下了一层基础，因而对于新中国的催生工作，也多少尽了它一点绵薄的力量”。事实上，它在武大师生员工参加“反帝、抗暴，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以及在解放前夕开展的“反对破坏”、“反对迁徙”、“保校护产”、“联防应变”、“安全互助”等一连串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宣传教育和组织作用。解放后，它的全部藏书成为校图书馆宝贵的财产。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历史上，“六一图书馆”成为光荣的一页。

解放前的三十多年，本馆走过的道路是很曲折的，发展非常缓慢。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藏书总量仅有十六万三千七百余册，十八个工作人员，两百一十七个阅览座位。藏书虽有一部分革命文献、优秀著作和珍贵资料，但是，就整个内容来看，藏书不成体系，而且有相当数量内容陈旧，质量低劣。业务管理和服务方式陈旧落后。解放后，要使其尽快适应新中国教育的要求，就必须进行彻底整顿和改造。

二

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武汉大学图书馆也获得了新生。回顾解放后的三十多年，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然而，它和我们的整个事业一样，终归是战胜了重重困难，迅速地发展了。

解放初，图书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尽快进行整顿和改造。在学校党政领导下，大力贯彻执行“整旧理新，便利读者，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而服务，为将来图书馆的发展打好基础”的方针，积极展开工作。

首先是加强领导，充实人员，调整机构。当时，学校百端待举，任务很重。但是，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接受武汉大学后，立即成立了由石峻、陈家芷、周景俞三教授组成的“图书管理委员会”，并立即着手清理图书。又选派得力干部加强图书馆的领导，调整补充了工作人员。到一九五七年全馆人员已经增加到三十五人。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后，出席这次会议的副馆长许俊千先生向大家传达了大会精神。全馆人员认真学习贯彻大会通过的高校图书馆《条例》，进一步明确了高校图书馆的性质和任务，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图书馆合理调整了机构，将原来的中文股、西文股、出纳股、杂志股、总务股改为相应的五个组。为了加强采购工作，单独成立了订购组。嗣后，又成立了研究组，负责咨询辅导等。各组干部也作了适当调整。建立了馆务会议制度，定期举行会议，使一些重大问题都能及时得到研究解决。

其次是整理旧藏，补充新书。早在一九四九年六至七月间，对藏书进行了第一次全面清

点。一九五〇年又成立专门工作组，制订了具体方案，对藏书开始系统整理。在全面清点的基础上，对藏书内容进行了审查和剔除。建立了“提存书库”，加强了藏书的组织和管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六一图书馆”等的藏书共八千余册，充实到图书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接收了院系调整中从南昌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大学等院校调拨来的五万余册书刊。同时，本校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哲学系及外文系英专等相继调整出去，有关书刊四万余册也随之调走。

在清理和调整的同时，大力进行了新书补充。仅一九五二年就购入图书九万二千五百余册。一九五六年购入的图书更多，达十万三千四百五十册。自一九四九年八月以后的八年多时间内，共购入图书四十四万九千多册，为解放前三十多年入藏总量的二点七倍。其内容绝大部分是我校教学和科研需要的马列主义著作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类图书。

经过上述一系列清理、调整和补充，整个藏书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馆藏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第三是积极开展读者服务工作。为了密切配合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工作，一九五〇年就建立了“马列主义研究室”和“教员参考室”，给师生学习马列主义和使用教学参考书提供了方便。一九五六年又建立了“第三阅览室”，随后又将其扩充为“文科图书室”。该室主要收藏文艺类图书、部分马列主义著作、其他社会科学类著作以及线装书和内部资料等，进一步满足了师生员工的需要。这一时期还配合形势教育举办了各种展览，如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举办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展览”，为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举办了“美帝侵华史展览”等，展出了大量书刊资料，紧密配合了形势教育，受到学校领导和观众的赞扬。

第四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解放初，图书馆原有的许多规章制度不能适应工作要求，废除不合理的旧制度，建立适合教学和科研需要的新章程，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一九五〇年，首先重订了书刊借阅规则，制订了遗失赔偿和逾期处理办法。采购原则、选书办法、经费管理和使用都进行了改革。其他规章制度也相继作了修改或重订。通过上述工作，使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趋于合理，为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和改进管理工作创造了条件。

经过数年的努力，“整旧理新，便利读者”的方针得到了很好落实。一九五八年后，图书馆努力宣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馆同志精神振奋，积极革新，千方百计提高服务水平，使图书馆工作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一、藏书建设有了新的加强。首先，进一步修订采购原则，改进采购办法。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明确采购图书必须以马列主义著作和教学、科研用书为重点，坚决贯彻“保证品种，适当购买复本”的原则，认真选购各个学派、各种学术观点的著作。采购图书注意依靠群众，在各系成立“选书小组”，组织有经验的教师协助选购图书。设置“意见箱”，实行“图书请购单”等，尽可能吸引读者推荐购书，使采购工作减少了盲目性。

补配缺藏书刊是藏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仅一九六一年四季度，就补配缺藏书七千余册，外文期刊二十七种，中文期刊一千二百余册，提高了馆藏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藏书总量也有较大增加，到一九六三年八月，已达到八十五万余册，年订各种期刊一千八百多种。这一时期藏书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

其次，改用新分类法，提高分编质量。早在三十年代，我馆采用了杜威分类法和“中国十进分类法”，在当时，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到了五十年代，这些分类法却成了图书馆工作的桎梏，改旧换新，势在必行。一九五八年七月，全馆同志和图书馆学系的师生同心协力，竟月苦干，用《科图法》改编了二十三万余册中文书。到一九六三年八月，除二十多万册新书

外，共改编原有藏书二十八万五千多册。藏书和目录都按新分类体系组织起来，整个藏书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一步适应了教学和科研发展的要求。

二、读者工作有了新发展。

首先，改进外借方式。优先满足教学需要是高校图书馆服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教学参考书的使用，一般是时间集中，复本量大。但是，图书馆采购的复本有限。为了更好地解决好供求矛盾，一九五九年组织了“教学辅助书库”，对主要教学参考书采用“集体外借，计划分配”的方式，较好地满足了教学需要。一九五九年九月，又首先在文科图书室试行开架外借，收效明显，读者数和借书量分别增加六倍半和七倍半。一九六〇年四月，又决定进一步扩大开架范围，图书利用率大为提高，年外借量达到二十二万八千七百多册。实践证明，开架是充分利用藏书的有效方式之一。同时，实践也告诉我们，开架方式也有其弊端。开架和闭架应该同时并存而不能互相取代。图书馆及时总结经验，提出了“分别对待，缩小开架范围”的意见，对开架外借及时作了调整，使开架和闭架这两种方式密切结合，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外借工作的水平。

其次，加强了书目服务。早在一九五四年，本馆即开始编印定期《新书报道目录》，以后又陆续编制了一些专题书目。一九五八年后，加强了这项工作。先后编制了“半导体”、“原子能”、“无线电”、“固体物理”等八种中文书目和“自动化”、“电子学”等俄文书目以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索引等，还参加四十七所高校图书馆外文期刊、中文期刊和日文期刊《联合目录》的编制工作，还编制了“地质”、“物理”、“钢铁”、“电机”、“政治”等专题书目，一九六三年又编制了馆藏善本书目目录等。书目工作的开展，密切配合了教学和科研，也标志着读者服务工作的深入和加强。

第三，加强了阅览参考。这是高校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又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时期，本馆先后成立了“文科教师参考室”、“文科学生参考室”和“内部参考室”。并将“科技参考室”扩充为“理科参考室”。一九六三年暑期，全馆同志冒着酷暑溽热，将“内部参考室”的旧书全部整理改编。同年，又整理了馆藏工具书，成立了“工具书参考室”。阅览座位也增加了，一九六四年达到一千三百六十多个。阅览参考工作的加强，提高了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水平。

第四，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开展。利用书刊开展宣传教育是图书馆的基本任务。除了大量的新书推荐宣传和配合新生入学教育外，积极开展资料剪辑和举办各种展览。据统计，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六月，共剪辑各种资料一万五千余份，编成“时事政治”、“文化教育”、“经济建设”等专题资料一百二十多册。另外，还举办各种展览，如“毛主席著作展览”、“东风压倒西风图片资料展览”、“科技图书展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周年展览”和“纪念列宁诞生九十一周年展览”等。这些工作都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受到师生员工和学校领导的赞扬。

三、管理工作有了新的提高。随着全馆工作的不断发展，管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起来。尽快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显得尤为迫切。一九六二年到次年上半年，全馆各部门都在系统总结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和修订了各种规章制度。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八日，校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暂行条例》、《武汉大学图书馆书刊采购办法》、《武汉大学图书馆期刊借阅规则》、《武汉大学系图书资料工作暂行办法》等，并予正式公布执行。同年九月，又将这些规章制度和其他规章制度汇编成册，成为开展和检查各项工作的依据。另外，自办装订厂，修补整理了大批书刊，编制了期刊分类表，进一步健全了典藏目录等，使整个管理工作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图书馆的发展变化是很大的,形成了一个比较厚实的基础。但是,也受到了一些“左”的思想影响,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如曾一度片面强调方便读者,对管理工作和藏书建设重视不够,目录组织尚不完善,藏书特色还不够突出,藏书组织缺乏层次且过于分散,书刊资料的统筹协调、剔旧处理、安全保护以及总务工作等都显得比较薄弱,即使是读者工作,也多半是停留在一般借阅上,参考咨询和读者辅导等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新的发展中去解决。然而,不幸的是遇到了十年动乱,这些问题不仅未解决,反而使已经形成的基础遭到了破坏。“文革”开始到一九六九年间,混乱情况严重,尽管图书馆一些同志不忍心藏书遭到破坏,在混乱中力图保护它们,但是,图书馆终归无法幸免于难,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情况:队伍涣散,机构瘫痪,规章制度被废止,大批书刊被封禁,甚至被搬出馆外听任虫蛀、鼠咬、受潮以至霉烂和散失。书库管理松懈,曾多次被盗,借书不办手续,目录也发生了混乱,各项工作一度停顿,造成了严重恶果。一九七〇年恢复招生后,学校对图书馆工作给予了很多关怀,增加了经费,添置了桌椅,一九七五年又决定筹建新馆等。全馆同志在师生员工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工作。但是,由于“四人帮”一伙仍在台上,图书馆工作终未摆脱困境。

粉碎“四人帮”后,图书馆出现了新的发展转机。校党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图书馆工作。一九七七年决定改变“馆、系合一”的形式,由一位副校长分工负责图书馆工作;选派干部充实馆领导班子,扩大图书馆用房,增加图书经费,添置家俱设备,补充专业人员,重新设计并开工兴建新馆,切实落实政策等。特别是在党的三中全会后,在全校师生员工和各部门的关心与支持下,全馆同志不悲观气馁,不惧怕困难,同心协力,勤奋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恢复和整顿:①开放“禁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组织专人审查开放了大批被长期禁锢的所谓“封、资、修”图书,对宣扬“四人帮”那一套的图书进行了剔除。②全面清点藏书。从一九七九年十月开始,成立专门小组,经过三年苦干,共清点书刊一百四十多万册,整理补充典藏卡片百余万张,并对藏书初步进行了剔除和处理。③催还图书。结合改进借阅办法催还了长期滞留在读者手中的上万册图书。④补充新书。六年来共入藏新书四十三万余册。⑤加强队伍培养。从一九七九年,对全馆人员进行分类培训,并开始向国外派遣馆员进行业务考察学习。⑥恢复和修订规章制度。⑦积极开展国内外书刊资料交换。

一九八一年九月,在第二次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上,本馆被聘为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委员馆,十月初,出席这次会议的副馆长向校党委汇报了大会情况,校党委决定召开全校图书资料工作会议,传达大会精神,讨论本校图书资料工作的现状并提出改进办法以及成立校图书馆委员会。校图书资料工作会议于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正式召开,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推选童懋林副校长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路见可教授和石泉教授为副主任委员。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恢复和整顿、认真宣传贯彻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精神,使图书馆工作走向新的健康发展的道路。当前,为了适应学校工作发展的需要,正在兴建一座面积为一万五千五百平方米的新图书馆,预计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可交付使用。届时,图书馆仍将在三个地方开展工作,除系(所)专业阅览室外,将设置各种阅览室二十二个,拥有近两千五百个阅览座位。新馆内将设学术报告厅、声象资料室、显微阅读室、文献复制室以及电子计算机、自动传送等现代化设备,服务和管理水平以及整个图书馆工作将会有较大的提高,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将会更好地得到满足。